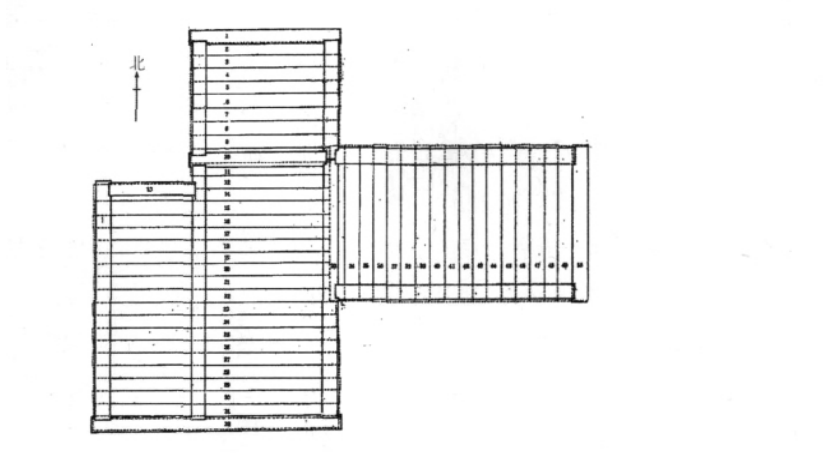


# 曾侯乙墓椁室形制与礼制考

黄敬刚

曾侯乙墓形制独特,考古学者称其为“不规则多边形”。一般王室墓主皆置于中间墓坑,曾侯乙主棺则陈于东室,中室放置随葬的礼乐器,当以崇尚礼乐为主旨。中室、东室是曾侯乙墓的主体结构,西室、北室长宽不一,当为主体之附属。墓葬为岩坑竖穴,深至11米以上,外棺、内棺总重约9吨,土坑竖穴,未设墓道,可印证所谓“诸侯皆悬棺而下”,这对研究古代墓葬制度和礼制极为重要。

曾侯乙墓在坚硬的红砂岩上开凿墓圻,墓壁垂直光滑而不见斜坡墓道,也没有供构筑者上下的二层台,均在“直悬而下”<sup>①</sup>的诸侯等级之内,椁室均以大型樟木构成。《礼记·礼器》载:“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以多为贵也。”<sup>②</sup>古代社会中“事死如事生”,天子、诸侯依次列出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了一整套丧葬习俗。笔者试以曾侯乙墓的棺椁制度分析曾国葬礼(参见图一)。



图一 曾侯乙墓木椁底板平面图(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

## 一、椁室建筑结构的“不规则多边形”

椁室的设计和构筑与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习俗以及社会经济基础有关。《荀子·礼论篇》云：“故圜垠，其貌象室屋也。”<sup>③</sup>这种墓室的设计与建造，或许与死者生前宫室相近。《仪礼·公食大夫礼》“宰夫筵出自东房”，注云：“天子诸侯左右房。”<sup>④</sup>《仪礼·士冠礼》“陈服于房中西墉下”<sup>⑤</sup>，《礼记·丧大记》疏云：“房中者，东房中也。大夫、士惟有东房故也。”<sup>⑥</sup>可见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曾侯乙墓椁室的设计虽具备文献所载多室、房的结构，但其设计思想与楚墓、周人墓葬主棺室居中的特征又不相符。《礼记·丧大记》“妇人髻，带麻于房中”，郑玄注云：“带麻于房中则西房也，天子、诸侯有左右房。”<sup>⑦</sup>曾侯乙墓西室即为附属建筑，殉葬13位女性，反映了曾侯乙生前的奢华荒淫。何谓“椁”？《周礼·地官·冢师》注云：“椁，周棺也。”<sup>⑧</sup>《礼记·丧大记》注云：“椁，谓周棺者也。”<sup>⑨</sup>《礼记·檀弓上》注云：“其椁厚棺一尺……从下垒至上。”<sup>⑩</sup>可见椁就是垒砌在墓圹四周和各个室的隔墙。又《礼记·礼器》孔颖达疏云：“古者为椁，累木于其四边，上下不周，致茵于椁下，所以藉棺。从上下棺之后，又置杭木于椁之上，所以杭载于土。”<sup>⑪</sup>亦可证曾侯乙墓椁室建筑结构。上举所谓“椁”，皆指用大木垒砌而成的椁室。虽说棺、椁概念时有混淆，但“周棺”以大型方木构筑而成并形成椁室，则大致可定。《礼记·檀弓上》云：“国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sup>⑫</sup>可为旁证。

史载棺椁制度甚详，若把文献记载中的“椁”与曾侯乙墓大型椁室进行比较，则可印证战国早期木椁建筑结构的特点。曾侯乙墓从墓坑底部、椁室诸壁及其椁盖均以大型规整方木构成。椁由底板、墙板、盖板共171根长条方木垒成，形成东、北、中、西四室，在各室之间隔墙最下层设有小型门洞<sup>⑬</sup>。其中各室之间隔墙最下层设小型门洞，这是一个重要特点。至于小型门洞的功用，迄今尚无一致的看法，有待进一步探讨。

诸多学者把曾侯乙墓椁室称为“不规则的多边形”。椁室为正南北向，北室与中室相对在一条中轴线上。《曾侯乙墓》发掘报告认为“西室与中室并列而略短”，“东室单独向东伸出”，其与中室形成曲尺形状。北室甚短，中室与东室从结构看应为主体椁室，形成有规则的曲尺形。因西、北二室不规则，当是中、东室象征性的附体建筑物，正是有了这样的推测，才把西室理解成编钟的后台，其中所殉葬的21具女性棺具的主人当是为曾侯乙生前演奏编钟的歌伎舞女。北室短小，随葬有车马器、兵器、竹简以及漆甲残片，曾侯乙墓椁室设计思想与结构是因功能而异的。

曾侯乙墓椁室设计与建造，是有特定原则的，椁室大则与楚国墓室形制特点有较大的区别。楚墓中有九室墓、七室墓、五室墓、三室墓和一、二室墓等。细加分析，楚王墓椁室大致为矩形，如楚幽王墓椁室整体呈正方形，椁室结构为方木平铺或者垒砌而成，内分成九个室，墓主人棺放在中间一室，在四周分设头厢、足厢、边厢。布局呈三横三纵相隔，再用铜、锡构件衔接。椁室四周填充青膏泥<sup>⑭</sup>。郭德维在《关于寿县楚王椁室的复原》一文中，对楚王椁室形制、布局、形态、室数进行过研究<sup>⑮</sup>。楚墓七室墓主棺居中，以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为例，楚墓五室墓为楚封君和大臣墓，以新蔡平夜君、信阳2号墓、湖南九里1号墓、包山2号墓和九连墩1、2号墓为例，基本上是以主棺室居中为特点<sup>⑯</sup>。从上述楚国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墓葬看墓主棺均为居中的特点，才能正确理解曾侯乙墓椁室的设计思想。曾侯乙墓主棺室不居中，重要原因是中室陈放着钟磬和丝竹管弦乐器，才将主棺置于东室，这种崇礼重乐的主旨，以目前挖掘所见，在古代

君侯陵墓中前所未有。东室居主棺,中室为中心陈放青铜礼器和八种125件金石和丝竹之乐,为曾侯乙墓椁室建筑最突出的特点,即曾侯乙墓设计、建造是以礼乐制度为中心的。

《礼记·檀弓上》“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sup>⑦</sup>曾侯乙墓棺椁的用材,均为梓木,从北室北端到东室南端长为15.72米,从东室至西室两末端算起,两者之间共长19.7米。梓木经过斧、斤、锛、凿加工而成。譬如中室东壁一根长达10.6米,宽厚为0.5—0.65米,其体积约3.2—3.4立方米。可见曾侯乙墓仅椁室就使用加工木料378.633立方米,约相当于圆形长木500多立方米<sup>⑧</sup>。《礼记·檀弓上》“柏椁以端长六尺”,孔颖达疏:“柏椁者,谓为椁用柏也,天子柏,诸侯松,大夫柏,士杂木也。”“以端者,端犹头也。积柏材作椁并葺材头也,故云以端。”“长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长六尺而方一尺。”<sup>⑨</sup>曾侯乙墓棺椁均为梓木,与此有别。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侯的墓葬制度和厚葬盛行反映出礼制已渐渐衰微。曾侯乙墓椁室建造的工程浩大,显示出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椁室结构复杂表现出其科学技术水平先进,各室相互之间留有小型门道、“不规则形”椁室结构与布局等,似与讲究实际用途的设计理念有关,这对于解析曾侯乙生前的生活形态以及战国时期曾国所遵从的礼乐制度源头,不无裨益。

曾侯乙墓椁室建筑艺术和礼乐制度,浓缩了曾侯乙尊周崇礼的思想。否则,曾侯乙墓椁室就会以方正设计理念展示在人们眼前。在曾侯乙墓发掘与研究中,诸多学者仍未解析的曾侯乙墓“不规则形”的成因,笔者以为这种椁室就是曾侯乙尊祖尚礼的真实表现,在礼乐制度的前提下突出一个中心就是音乐。楚墓椁室有九室之制并不多见,也有七室之繁,再有五室之别,次之三、四室不同,看来椁室多少与等级制度有关。曾侯乙墓椁室与楚墓椁室建造与用材不同,楚以板式木材隔墙分椁,还用附件相互连接,而曾侯乙墓椁室是用一根根整木砍成约0.6米见方、最长达9米之巨的大型方木逐层垒砌,相互交叉咬合,不见钉铆,真有鬼斧神工之感。椁室是以中室和东室为主体,而西室和北室两个椁室是中室和东室的附属建筑物。

楚墓信阳长台关、江陵天星观、望山楚墓及长沙马王堆和江陵诸地西汉墓,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墓的椁室均分成若干个边箱和头箱。郭德维认为:“就规模最大的信阳长台关1号墓来说,其整个椁室规模,也不及曾侯乙墓的一个东室大。那一种分箱,并不像曾侯乙墓这样才是真正分成几个室。曾侯乙墓椁室,这一种分室的方法,应有所本。”<sup>⑩</sup>这就明确地指出楚王墓虽大,墓椁室显得复杂并设立头箱、边箱,却不见有曾侯乙墓椁室那么宽大的。

## 二、曲悬之制与椁室形制

曾侯乙墓椁室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专家对此曾有多种解释,郭德维认为:“曾侯乙墓椁室完全仿照地面建筑。”“虽无法和故宫的三大殿相比,但和故宫一些偏殿的居室相比,也不会小多少。就室内的摆设说,除北室、西室较挤以外,中室和东室仍有空余场地可供人们活动,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曾侯乙墓椁室反映的是宗庙(宫室)局部,不过曾侯乙墓椁室是更真实地反映了宫室(部分)的实际。”<sup>⑪</sup>他对椁室分间的判断,认为是曾侯乙生前宫殿或寝宫的真实反映,有一定道理。王从礼认为:“曾侯乙墓形制之所以和大多数楚墓不同,关键在这些诸侯或封君们享用另外一类的墓室建筑文化。”“其墓圻形制在楚墓圻中虽属首见,但椁室布局和墓室的构筑方式在楚墓中较多见。如湖南九里楚墓地中的部分墓室和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椁室皆应属于此种类型,即为多边形。”<sup>⑫</sup>上述两种推理,均在椁室形制和解析“不规则多边形”上

与楚墓类比,未涉及形制之设计思想。有些楚墓椁之外形呈长方形或方形,将室分隔成曲尺形也有之,宋公文、张君即云:“长沙烈士公园3号木椁墓一椁二棺,西向:‘内棺紧相接,而在外椁的西、北两面留有空隙,用薄木板隔成曲尺形(按:即“厂”形的形头箱与边箱)’。”<sup>②</sup>此种形制是椁室内的分隔形制,与曾侯乙墓椁外形制虽有相似之处,但意蕴有别。笔者经长期对曾侯乙墓文化研究,认为可以从礼乐制度的角度加以思考。曾侯乙颇具音乐天赋,不仅铸制了精美绝伦的编钟,还在随葬曾侯乙墓的青铜器铭文中,把“乍”加上音旁,形成一个专用字“𠩺”<sup>③</sup>。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铭文中很难找到带“音”字旁的“𠩺”字,曾侯乙墓所出土的这一批青铜礼器上标注的“𠩺”是有特殊意义的。酷爱音乐的曾侯乙,把其椁室东、中室设计成曲尺形的形体,与曲尺形的编钟横梁曲悬之制相对应。其西室隐含着敲击编钟的歌伎乐女们出入休息与换装的后台,北室乃为存放载歌载舞者各类道具的储藏室<sup>④</sup>。西室与北室在长、宽尺寸上均小于中室和东室,曾侯乙墓不规则多边形,则体现出礼乐制度的核心思想与意蕴。从乐悬制度看曾侯乙墓椁室的礼制规范,曲尺形椁室与曾侯乙编钟横梁呈曲尺形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周礼·春官·小胥》郑玄注:“轩县(悬)三面,其形曲。”<sup>⑤</sup>曾侯乙编钟架为曲尺形,加上椁室北面一组石磬,正好是一“轩县(悬)三面”(曾侯乙墓编钟曲尺形排列,见封四)。

“曲尺‘L’形”与曾侯乙墓椁室“不规则多边形”有着什么联系,“𠩺”字隐含何意?笔者认为,曾侯乙墓“不规则多边形”形制不仅与宫殿建筑有密切关系,而且是与以音乐制度形成的“曲悬”与“曲尺”有所联系。中、东室为主体,形成曲尺形,与曲尺形编钟横梁相对应,可与礼乐制度中的乐悬之制相印证。冯光生在《曾侯乙编钟若干问题浅论》一文中,对铸钟年代、组编过程及悬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曾侯乙编钟曲尺形横架最能体现当时礼乐制度中的乐悬制度<sup>⑥</sup>。并列数例:其一,安徽寿县蔡昭侯墓一套甬钟、一套钮钟、一套编钟,根据出土时在墓坑的摆放位置推断为“如曲尺‘L’形”<sup>⑦</sup>;其二,河南固始发掘的侯古堆一号墓,出有九鼎、编钟、编磬各一套,其编钟架为“如曲尺‘L’形”<sup>⑧</sup>;其三,随州擂鼓墩2号墓内出编钟36件,出土时摆放的位置推断为曲尺形<sup>⑨</sup>。综观诸墓,多把编钟、编磬之类青铜乐器,按“曲悬”中的“乐悬制度”分两处(南壁、西壁等)摆放,隐含着诸侯所享用“轩悬”的礼乐制度。所谓“轩悬”、“曲悬”之说,《左传·成公二年》:“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sup>⑩</sup>贾谊《新书》卷二《审微》曰:“曲悬者,卫君之乐体也。”<sup>⑪</sup>对“轩悬,三面,其形曲”的解释更明白。其实,西周礼制规定的乐悬制度编钟、编磬金石之乐的使用与悬挂形式,其等级与身份表现一致,不得擅自超越乐悬礼乐制度的规范。王子初在《太原晋国赵卿墓铜编钟和石编磬研究》一文中认为:“太原赵卿墓编钟,为豪华的编钟形式,规模达19枚之巨……若按‘轩悬’的制度来加以考虑……构成‘曲悬’的形式,加上编磬一列,正成‘三面,其形曲’的‘轩悬’之制。”因此,“将该墓出土乐器的乐悬确定为轩悬之制应是可信的”<sup>⑫</sup>。

综观诸家对“三面,其形曲”之轩悬礼乐制度的考证,可知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王虽说尚乐并推崇礼乐制度,但其享受金、石之声的雅乐,仍深受周王朝森严等级制度限制。此则更说明“曲悬”乃举足轻重的乐礼制度,这是伦理与礼乐思想的交融(曾侯乙墓编钟铜人,见封四)。《礼记·乐记》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由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sup>⑬</sup>因此,曾侯乙墓大型木椁“不规则多边形”是有章可循的。曾侯乙既以“礼”安邦治国,又以“乐”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动青铜铸造业、音乐、美术、科技、文化的进步。在曾侯乙寿终正寝前,把由一套青铜编钟和一



套石磬组成的金石之乐,及其丝竹管弦诸多乐器随葬,并将墓圻、木椁、椁室设计建筑的主旨,有意框定在乐悬制度和诸侯王能够享用的等级里,就连随葬的青铜礼器上的文字“𠄎”与音乐相对应,也能体现曾侯乙以椁室取“曲尺形”表现“曲悬”乐礼思想的良苦用心,即以“曲尺形”钟架渲染曾侯乙崇尚“轩悬”(即曲悬)乐悬制度。

《吕氏春秋·节丧》曰:“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擧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sup>⑥</sup>此与曾侯乙墓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崇礼尚乐之俗相同。“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一语道出只要经济雄厚,就可施行厚葬,耗资耗材耗力也是社会风俗允许的。又《吕氏春秋·节丧》:“世俗之行丧,载之以大輶,羽旄旌旗、如云倮倮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饬之,引𦘒者左右万人以行之,以军制立之然后可……苟便于死,则虽贫国劳民,若慈亲孝子者之所不辞为也。”<sup>⑦</sup>曾侯乙享年四十余岁,正是他年富力强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曾国的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达到同时代的巅峰,其伟业应该在承继先君基业上得到更快的发展。也就是曾侯邈、曾侯郈或更早年的先君,打下了其称雄的基础。战国以降的曾国应该与楚国结下联盟,楚王熊章送给曾侯乙铸钟可证曾(随)国被尊为汉东诸侯强国的地位,汉东之国随(曾)为大,表现其为江汉诸姬姓的领首。

笔者认为,曾侯乙椁室“曲尺形”与编钟横梁“曲尺形”不是巧合,正好印证古人“事死如事生”的思想。《礼记·礼器》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sup>⑧</sup>曾侯乙尚崇乐悬制度的尚乐理念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 三、西、北、东、中室设计与礼制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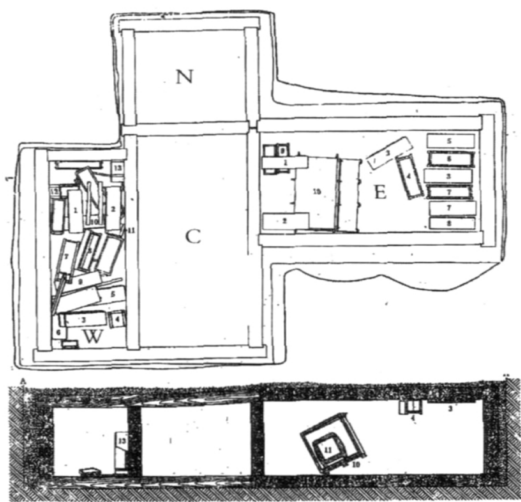
古人设计陵墓大多要反映当时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更能体现其礼制思想观念和文化内涵。曾侯乙墓共有四个室,中室和东室,形成一个“曲尺形”,即东室东西长9.50米,南北宽4.25米,椁室口至底深约3.50米。由“曲尺形”形成中、东椁室的整体化,展示出墓主人身份、地位、荣耀和精神意识的空间。中室为正南北向,位于东室的西部;东室为正东西向,位于中室的东部。形成这两个室长度、宽度、深度十分相近。彼此从整体上观其形、度其量、察其类,应为完美的“曲尺形”之状。四个椁室外形以曲为美,在曾侯乙墓椁室东西形成“曲尺形”,在东北角和西北角也都形成“曲尺形”形状。而“曲尺形”与曲悬、轩悬的乐悬制度关系,笔者前文已作了论述。

从建筑学的结构看,建筑群的主体部分是设计的重点部位。附属建筑无论从尺寸、大小、规模均次于主体。曾侯乙墓西室南北长为8.65米,东西宽3.26米,明显比中室面积要窄小,北室南北4.26米,东西4.75米,比中室和东室面积少三分之二<sup>⑨</sup>。我们据诸室形制及所陈列器物等现象,或可推测,西室是附属属于中室的建筑,象征着编钟演奏的后台;北室是附属属于中室编钟演奏的道具和酒类等器具储备库。若此说不谬,则曾侯乙墓中室象征他生前的“音乐宫”,宫中再现金石丝竹等八音之乐共奏与声起人舞的场面,演奏者拿起演奏的舞具尽情表演。可以想见演奏人员使用乐器多而复杂,这说明西、北两个椁室是曾侯乙编钟音乐宫所必备的附属建筑。

四个椁室的随葬品、殉葬品体现了建筑设计思想与礼乐制度密切相关。椁室的中心部位中室主要陈设“曲尺形”钟架和悬挂的65件钟及磬、鼓、琴、瑟、排箫、篪、笙等125件乐器,以及大型酒器和青铜礼器等,此乃仿曾侯乙生前编钟音乐宫而设计建造。乐宫的主要用途是君主举行宫廷册封、接待来使、喜庆宴会和祭祀先祖等大型活动,所以说中室是曾侯乙生前地面“乐宫”的缩影。按曾侯乙编钟实际尺寸、造型、规模看,原来的“乐宫”是至少可容纳百人以上 的活动场地,包括乐队、歌舞、竞技表演和君侯宠臣的观赏台和酒宴活动场所。《诗经·小雅·宾

之初筵》曰：“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籥舞笙鼓，乐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礼……酌彼康爵，以奏尔时……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sup>⑨</sup>诸多青铜礼器和大型酒器应该是“音乐宫”的用品，曾侯乙用青铜铸制的礼乐器和生活用器展示了当时科技的发达程度，并有倡导崇周尚乐的礼乐思想。

曾侯乙主棺置于东室，中室陈列着钟、磬乐器和青铜礼器，两个椁室长、宽规整，墓圻幽深，形成木质钟架曲尺形，这一结构特点就使曾侯乙墓隐含了“曲悬”制度。东室陈设的随葬品，与曾侯乙生活起居相关，应为寝宫，想见他生前的“寝宫”面积至少在此室十倍以上。主棺里面有内棺，这显然与其生前居住宫室建筑有关，宫中有宫，房中有房，雕梁画栋，附筑楼台亭阁。外棺铜框架结构，纵横交错，以立柱构筑的形式，尽现一座宫廷建筑的图形。并殉有8个女性（东室）葬具，以及琴瑟之类的乐器，大量金器和漆木器尽显豪华，连狗也使用葬具，这就说明东室是曾侯乙的“寝宫”，此与女性殉者和众多弦乐相符，说明这是他生前享用的“房中乐”生活的真实写照。以女性在房中弹拨丝竹管弦，如琴、瑟、笙、簫之类的乐器，可与东室随葬的乐器互为印证。曾侯乙生前爱狗如命，似有狩猎之好。综而论之，东、中二室就是曾侯乙崇周尚乐的历史见证，乐悬之制和曲悬之礼，尽在曾侯乙墓东、中两个椁室“曲尺形”的礼乐制度中显现出来（参见图二）。



图二 曾侯乙墓平、剖面图  
(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

从西室仅见葬具而无生活衣、食、住、行的殉葬物品，证明西室是“音乐宫”的类似后台的“化妆室”或演奏者临时“休息室”。当“音乐宫”演奏结束后歌伎舞女们就要离开这里，可见“音乐宫”建筑设计的总体布局。曾侯乙中室“音乐宫”也是礼乐制度中祭神崇祖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

北室也有象征通向中室“音乐宫”的门。在北室还陈放一对青铜缶，按器物用途应为容器，盛酒加盖密封，以备举行大型歌舞、宴请、祭祀、嘉奖功勋时，展示金声玉振、丝竹管弦和饮酒娱乐场面。“音乐宫”举行大型演奏活动时，少不了各类道具及服装，因而北室用途就是“音乐宫”最佳的“储藏室”，即舞蹈用具在演出前后的储藏之所。先看载歌载舞的道具，传世文献称之为“舞器”。《周礼·春官·宗伯》曰：“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陈，则授舞器。”<sup>⑩</sup>前述西室乃为歌伎舞女们在“音乐宫”演出之后台，有13具女性（西室）棺具为佐证。北室也应是“音乐宫”演出前后存放“舞器”的储藏室。谭白明认为：“总体说来，曾侯乙墓出土舞器在其全部出土物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它确实存在是无庸置疑的。”他又认为，这些舞器可分为巫舞类舞器：玉

首漆木杖、木杖、竹杖、竹、篋、晋投(投杖)、“走戈”、内棺漆画雉舞及舞器、武舞类舞器、短杆粗矛、短柄铜戈、木金钩、小木弓、盾、文舞类舞器、乐器演奏用具和乐器排箫、钟槌等,旁征博引地论述曾侯乙墓出土文武兼备的舞蹈舞器与用途<sup>①</sup>。笔者以为这些舞具正是存放于北室的。

椁室就是墓主人生前的别宫离馆。宫室之制,《说文·宫部》“宫,室也”段注:“宫言其外之围绕,室言其内。析言则殊,统言不别也。”<sup>②</sup>考古学者谓椁分间为室,其椁室象征着死前的宫殿,曾侯乙墓中室就是“音乐宫”,东室就是寝宫,也有称前宫后殿的。《尔雅·释宫》曰:“宫谓之室,室谓之宫。”<sup>③</sup>《尔雅·释宫》邢昺疏云:“古者贵贱所居皆得称宫……至秦汉以来,乃定为至尊所居之称。”<sup>④</sup>椁室建筑和设计主要参照地上生活原型进行仿造,也会受到当时宫室制度的影响。墓圻、椁室、棺具总脱离不了生活现实,此则为解开曾侯乙椁室“不规则多边形”谜团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其椁室“不规则多边形”实际上是有规则的“曲尺形”。

①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15页。

②①③⑦ 《礼记·礼器》《十三经注疏》本,第1431—1432页,第1432页,第1430页。

③ 王先谦《荀子集解·礼论篇》,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9页。

④ 《仪礼·公食大夫礼》《十三经注疏》本,第1086页。

⑤ 《仪礼·士冠礼》《十三经注疏》本,第950页。

⑥⑦⑨ 《礼记·丧大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77页,第1573页,第1585页。

⑧ 《周礼·地官·甸师》《十三经注疏》本,第727页。

⑩⑫⑬⑭ 《礼记·檀弓上》《十三经注疏》本,第1293页,第1292页,第1293页,第1293页。

⑬⑭ 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第13页。

⑭ 李景昀《寿县楚墓调查报告》《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⑮⑯⑰ 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第239页,第247页。

⑯⑰⑱ 王从礼《楚墓建筑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第294页,第303页。

⑲ 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⑳ 黄敬刚《曾侯乙钟铭书法艺术及其与音乐艺术的关系》,载《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㉑① 谭白明《曾侯乙墓舞器考》,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㉒ 《周礼·春官·小胥》《十三经注疏》本,第795页。

㉓ 冯光生《曾侯乙编钟若干问题浅论》《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145页。

㉔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编《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图二三。

㉕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年第1期。

㉖ 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编《湖北随州擂鼓墩2号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1期。

㉗ 贾谊《新书》卷二《审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㉘ 《左传·成公二年》《十三经注疏》本,第1893页。

㉙ 王子初《太原晋国赵卿墓编钟和石编磬研究》《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339页。

㉚ 《礼记·乐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28—1530页。

㉛① 《吕氏春秋》《诸子集成》第六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97页,第98页。

㉜ 《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十三经注疏》本,第484—487页。

㉝ 《周礼·春官·宗伯》《十三经注疏》本,第802页。

㉞ 许慎《说文解字·宫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1页。

㉟①② 《尔雅·释宫》《十三经注疏》本,第2597页,第2597页。

(作者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行政管理处)

责任编辑 山木